

打造与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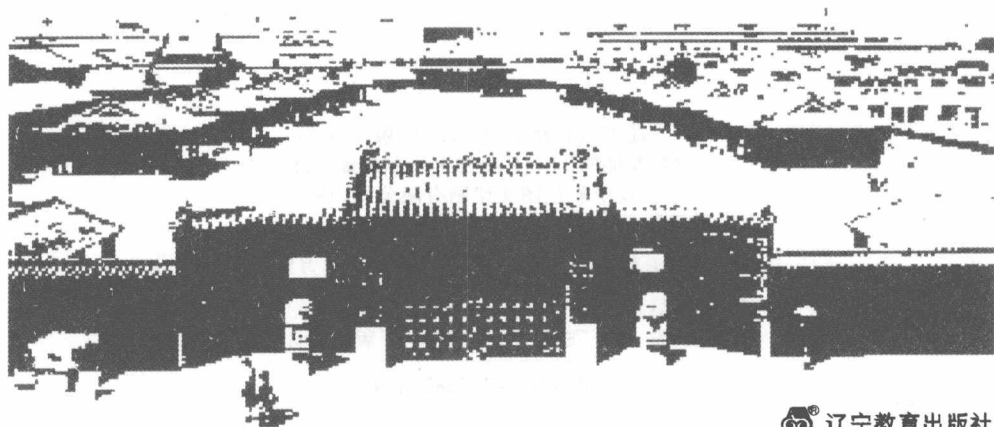
关于“康乾盛世”之官吏及“康乾盛世”

张新春◎编著

打造与状况

关于“康乾盛世”之官吏及“康乾盛世”

张新春◎编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造与状况：关于“康乾盛世”之官吏及“康乾盛世”/张新春
编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382-8491-1

I. 打… II. 张… III. 官制—研究—中国—清代 IV. 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109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175 毫米×250 毫米 字数：450 千字 印张：21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吉 睿 责任校对：吕志贵
封面设计：熊 飞 版式设计：熊 飞

ISBN 978-7-5382-8491-1

定 价：50.00 元

千里去承德

(代前言)

一直觉得“承德”这个地名很有意思。承，继承、秉承、承蒙；德，仁德、恩德、道德。“承”、“德”二字放在一起，如果不是作为地名，其意思是很显然的。雍正也正是为了缅怀先帝而将修建了避暑山庄后常“承受恩德”的“热河上营”小村命名为承德州的。作为地名、一方水土，承德所拥有的名胜古迹很是令人神往。从知道天下有承德这个地方时起，见识承德便成为我的一个小小心愿。机会终于有期而至，细雨蒙蒙中，我踏上了千里去承德的列车。

作为一个小山城，承德断然是没有什么可观的，不如其名字那样有意思。但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皇家御园——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地方，承德是很值得看一看的，是值得千里去一次的——从承德回来后，我这么认为；尽管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把避暑山庄游遍，也没有把外八庙看全。

外八庙其实是分布在避暑山庄外、武烈河（热河）两侧的 12 座寺庙的统称，在避暑山庄兴建后分别在康、乾两朝修建。外八庙的称谓是由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殊像寺、广缘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等 9 座由喇嘛管理的寺庙在北京设立的 8 个办事处（其中普宁寺与普佑寺合为一处）而得来的。当时在北京，就是这么称呼遥远热河的那 9 座寺庙的，行文或史载亦以“外八庙”统称之。后来，由绿营兵看管的普乐寺、广安寺、罗汉堂也归在了“外八庙”之列。这是“久而久之”的事了。如今，溥善寺、广安寺、罗汉堂早已毁于战火。看过有关资料，我只选择了普乐寺、普宁寺和普陀宗乘之庙。

外八庙主要是为皇亲国戚、王侯首领来避暑山庄祝寿、朝见时居住、礼拜、瞻叩而修建的。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寺庙，在促进了民族睦合、疆塞稳定的同时，也显现了清朝帝王的龙威……注目斑驳红漆、古朴屋宇，凝视残垣断壁、模糊碑记，今天的阳光再明媚，我也想象不出这里曾经有过多少或恢宏壮观或喧闹喜庆的场面。和“承德”一样，“普宁”、“普乐”的字面意义也很显然，就是普天下快乐、安宁之意。这是皇帝的良好初衷和美好愿望。强敌压境时，有多少皇帝不仅自己难保“乐、宁”，更甬说“与民做主”了。在不惜厚资筑就的雄伟辉煌面前，皇帝有时也会龙威扫地，丢掉“肩负”，把耻辱和困苦留给臣子百姓。

再看普陀宗乘之庙。从实际看以及从资料证实，它都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普陀宗乘”（梵语，音译）藏语为“布达拉”（音译，意思是观音菩萨居住的地方，即圣地），所以此庙又名“小布达拉宫”。1770 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六十岁，隔年皇太后八十岁，要举行祝寿大礼。这就是修建此庙的原因。不将其雄伟气势、金碧辉煌和皇帝及佛法联系起来，你会多些感慨、多些赞叹。

两百多年前的气候什么样不得而知，但今天的避暑山庄确是有暑难避。避暑山庄距北京和木兰围场（在承德北）均 250 千米左右，是皇帝每年组织木兰狩猎（实际就是长途行军、军事演习）的“活动中心”，一则可以借此对木兰习武的优秀者进行嘉奖表彰，二则可以方便地接触边塞的民族首领，三则可以来此避暑逍遥，四则也可以来此逃难——这是后话。五代以后咸丰皇帝能来此“避”难也肯定是当初康熙皇帝动议修建避暑山庄时绝没有想到的（甚至于康熙在题写“避暑山庄”牌匾时，特意将“避”字中“辛”旁的下半部多写一横以示区别于“避难”之“避”），更意外的是嘉庆、咸丰二帝还病死于此。

560 多万平方米的避暑山庄，我只去了正宫、如意洲、文津阁一带。这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皇家御园、世界级“文化遗产”是有点不恭的。过名字很好听的宫殿区正门——丽正门，就是正宫。据说正宫原来建在如意洲，后来有风水方士讲如意洲三面环水下面必有暗流，恐根基不稳，于是改建在现在的位置。现在的正宫由桥和狭长的洲岛与如意洲相连。正宫是皇帝和皇后、贵妃起居、办公、读书、戏乐的地方。正宫中的烟波致爽殿为皇帝寝宫，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咸丰皇帝便出逃（咸丰十年八月初八，1860 年 9 月 22 日）至此，且在殿西的一间屋里签批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咸丰皇帝签字的笔、桌尚透窗可视；后来他又在此间病死（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站在窗前，我在想象：咸丰帝颤抖着手，额上渗着虚汗，在一群金发碧眼的洋鬼子和一群奴颜婢膝的王公大臣的簇拥下签上“爱新觉罗·奕訢”……这间屋不大，可以说很小（难为皇帝了），可咸丰帝在此一落笔，就把 150 多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送人了——那可是相当于近 30 万个避暑山庄的面积啊！可怜大清皇帝爷，此时定难再有心、有力修什么避暑山庄之类了。

烟波致爽殿一墙之隔（有回廊相通）便是西所。

慈禧为什么叫西太后，说法之一是因为她在此居住过（亦说因慈禧曾居住在紫禁城西街储秀宫）。西所同样也不大。屋不大，却不影响慈禧办大事。她在此批览奏章、参议朝政、勾结奕訢、遥控京城，以致政变成功、垂帘听政。

在澹泊敬诚殿接见、宴请各国使节，在如意洲摆戏台，在鼓乐亭间举行大典，在四知书屋读书，在云山胜地赏月，所有这些都掩饰不住避暑山庄月黑风高之夜的刀光剑影和旷堂窄屋里的阴谋诡计。

避暑山庄最有名的建筑恐怕要属文津阁了，所以要另外再购票才能靠近它。作为全国7个贮藏《四库全书》的殿阁之一，文津阁不能不让我慕名而至、破费而近。正是文津阁所藏的一套《四库全书》得以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仿天一阁而建的文津阁，外观两层，实为三层，一、三层间一段长檐后面是不透光的藏书层。阁前有一池碧水，可白日观月。

出得文津阁，奔德汇门，便出了避暑山庄。浩浩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看不完殿堂楼阁轩斋官房亭榭廊桥寺庙观所等百余处景点，观不尽康、乾二帝分别用四字、三字命名的“七十二景”，更走不遍棒槌峰等“天开十景”。千里去承德，无论是否有德可承，都是值得的。

2009年5月

目 录

康熙朝中期那一段清官现象的形成	1
于成龙边廉边升	16
我很丑，可是我很廉能 ——施世纶散记	26
知县陆陇其	33
彭鹏：忠清而帝眷	42
汤斌：人人如之，又何致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47
张伯行遗疏：请皇上“励直臣”	61
陈鹏年与忤两任总督	71
清朝官员贪腐案的揭参 ——以康雍乾朝个案为例	77
清朝惩处贪劣官吏时的株连 ——选自康雍乾嘉朝的个案实例	92
清康雍乾朝被处理官员的复用	101

“有古大臣风”

——读《啸亭杂录》（之一）114

“以廉能著”

——读《啸亭杂录》（之二）128

“以贪……”

——读《啸亭杂录》（之三）140

康熙帝忧勤患廉149

勉之、慎之：雍正帝朱批常用语

——兼撷雍正帝朱批中语言及思想之英162

雍正帝的“儿戏”做法178

乾隆帝论宽猛及其他196

清朝第一奏疏：论进君子退小人209

上疏进折：给皇上出点好主意214

从苗澄到梁肯堂

——康雍乾朝直隶大吏概说223

汪辉祖《佐治药言》之“要言”242

官吏良优：以当朝妇女的态度为凭

——并欣赏她们的识见248

在“小责小罚”中成就发达的和珅262

和珅当权：有人不惧之271

盛世没落：盛世下的奢靡与贫困282

■附一■

言论摘录：关于“康乾盛世”的始终点310

■附二■

盛世“终点”：且看嘉庆元年、四年、十八年的重要人物和事件312

后记323

康熙朝中期那一段清官现象的形成

在顺治朝末年、康熙朝初年，吏治败坏，贪贿成风。康熙亲政后，便积极引导、逐步推行清官政治，大力整顿吏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贪贿之风受到了遏制，官场政治渐获清明，转而呈现出清官辈出的局面。最终清官辈出所形成的良好的从政环境，非常有利于某一清官个体作用的发挥。在贪贿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清官个体很难发挥作用，不只在从政实际中，即使在示范作用上也是很小的——这时的清官太扎眼、太具个性，其出现也太具偶然性，而其结局也大多不妙，所以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去参照；更多的人即使主观上不去学得贪枉，也不会苦苦地操守清廉。

就现形和影响程度而言，贪官总比清官多。这可能因为，同树立清官相比，打击更多——古今中外如此。康熙一朝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清官比贪官多，甚至只有典型的清官、没有典型的贪官。在封建制度下，这当然是和康熙个人的作为分不开的。但如果站在“家天下”的“低度”去评价康熙的作为——特别是其在吏治方面的作为，那也是不公正、不客观的；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康熙在吏治方面的作为，要看到其历史借鉴意义。

清官对清官的援引、荐举

清官对清官的援引、荐举应该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官官相护”。这和贪官奸臣的广植党羽有本质上的区别。康熙帝亦非常注意发动各级官吏特别是一些居官清正的官吏保举推荐清正贤良之士以备选用，比如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帝便命居官清正的郭琇、张鹏翮（音河）、彭鹏、李光地、徐潮等举荐道员以下、

知县以上“实心惠爱民生、居官清廉”的官吏。这是规模较大、较正规的一次。陈康祺^①所著《郎潜纪闻初笔》（卷三）中记录了另一次“康熙朝谕九卿举廉吏”事：“康熙二十九年谕九卿察举廉吏，灵寿（今河北石家庄市灵寿县）令陆陇其、三河（今河北廊坊三河市）令彭鹏、清苑（今河北保定市清苑县）令邵嗣尧、麻城（今湖北黄冈麻城市）令赵苍璧，同被引见，擢隶宪府。四人者，果皆耿直廉干，声实俱美。圣祖（康熙帝）之知人则哲，用贤勿贰如此。”根据《清史稿·志八十四·选举四·制科、荐擢》中记载，陆陇其为吏部尚书李天馥^②所举，邵嗣尧为户部尚书王鹭（音智）所举，赵苍璧为文华殿大学士徐元文^③所举，“及廷推时，帝复问左都御史陈廷敬^④廉者为谁？廷敬亦以陇其、嗣尧天下清官为言”。李天馥、王鹭、徐元文、陈廷敬皆其时当权好官。

出巡时、官职空缺时，康熙也能积极征寻（询）清正贤良之士，这使得一大批清官脱颖而出。《清史稿·志八十四·选举四·制科、荐擢》中记：“（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康熙）谕部臣保举应补关差，金（音千，众人）以‘有才及谨慎者不乏人，而操守实难知’对。帝曰：‘清操如何可废？如郝浴居官甚好，犹侵蚀钱粮^⑤，

① 陈康祺，鄞（音银）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咸丰七年秀才，同治十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员外郎，在京仕宦10年，郁郁不得志，乞外任为昭文县（今江苏常熟市）知县；所著《郎潜纪闻》初笔（14卷）、二笔（又称《燕下乡脞》（音cuǒ，琐细）录》，16卷）、三笔（又称《壬癸藏札记》，12卷）、四笔（又称《判牍余沈》，11卷），共53卷。《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1版，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郎潜纪闻四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1版，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② 李天馥，永城（今河南商丘永城市）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历任户、吏部侍郎及工、刑、兵、吏部尚书，康熙三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其为官“杜绝苞苴，严峻一无所私，铨政称平……清静和平，与民休息”；其曾有言：“变法不如守法。奉行成宪，不失尺寸，乃所以报也。”（《清史稿·李天馥传》）

③ 徐元文，昆山（今江苏苏州昆山市）人，少沉潜好学，顺治十六年殿试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累迁国子监祭酒、经筵讲官、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十九年擢左都御史，时刚平“三藩”，当“廷臣多称颂功德”时，其独建言“振纪纲以崇大体，核名实以课吏材，崇清议以定国是，厉廉耻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图治本，抑营竞以儆官邪，敦节俭以厚风俗，正名分以绝奸萌”（《清史稿·徐元文传》）；后又历任刑、户部尚书，康熙二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掌翰林院。

④ 陈廷敬，泽州（今山西晋城市泽州县）人，顺治十五年二十岁中进士，累迁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左都御史，历任工、户、吏部尚书，康熙四十二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其有疏言：“方今要务，首在督抚得人。为督抚者，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民可徐得其养，养立而后教行……而皇上考察督抚，则以洁己教吏，吏得一心养民教民为称职，庶几大法而小廉。”（《清史稿·陈廷敬传》）康熙诏九卿举廉吏，特问陈廷敬，陈奏：“知县陆陇其、邵嗣尧皆清官，虽治状不同，其廉则一也。”有人提醒陈说：“两人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恐及公。”陈说：“果贤坎，虽折且怨，庸（反问）何伤？”

⑤ 此或源自诬告，参见《养吉斋丛录》（余录卷之八，429页）中所记：“……前抚傅（弘烈）某以军兴不时，挪移库金逾四万两，公（郝浴）请以库项扣抵；诸务倥偬，未及扣也。护印者劾公侵欺，部议落职追补，圣祖（康熙）言：‘公前任抚盐，后任巡抚，皆洁己爱民，免夺官，并免追库项，以昭优恤廉吏至意。’”吴振械（音遇）：《养吉斋丛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2月第1版，200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吴振械，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道光三年出任云南大理府知府，历任山东登州府（今烟台蓬莱市）知府、安徽凤阳府（今滁州市凤阳县）知府、贵州按察使、陕西巡抚及四川、云贵总督等职，著有《养吉斋丛录》、《黔行纪程》等。

魏象枢^①曾荐郝浴，此事安能豫知！朕信部院堂官清操而委任之，堂官亦信司官而委任之。但将有守之人举出，被举者自能效力。’是年（五月十六日），九卿、詹事、科、道遵旨疏举清廉：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②、范承勋^③，江南学道赵仑^④，扬州府知府崔华^⑤，兖州府（今山东济宁兖州市）知府张鹏翮，灵寿县知县陆陇其等。”时“江南总督于清端公成龙卒，上（康熙）谕诸臣，有清操如于成龙者，公议奏闻”^⑥，于是，九卿们公举了这7人。一个人诚心诚意地说另一个人好（特别是“真好”的，特别是“背地里”），有时是很难做到的，是需要一定觉悟的。问贤于贤，才会有一个良性循环。

康熙二十二年九十月间，康熙出巡到五台山，以敢于严惩乱圈民间冢地之旗人著称的“铁面”直隶巡抚格尔古德迎驾。当康熙向其询问地方贤吏时，格尔古德即向其推荐了灵寿县知县陆陇其、兖州府知府张鹏翮。格尔古德（钮祜禄氏）是满族镶蓝旗人，初为笔帖式，曾任弘文院侍读、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二十一年任的直隶巡抚。《清史稿·格尔古德传》中记“格尔古德清介，布衣蔬食，却馈遗，纤毫不以自污”。《郎潜纪闻二笔》（卷五）中有“格尔古德荐贤”一则：“……格尔古德，继于清端（于成龙）抚直隶，疏荐卢龙（今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令卫立鼎、灵寿令陆陇其，众论翕（音希，一致）然。及诏举贤能，九卿交推公（格尔古德）清廉莫及。盖正己荐贤，惟廉吏能知廉吏也。公与于公（于成龙）谥法，皆以清字，昔之保障畿辅者，足为诸道表率如此。”此前的康熙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曾在应诏举清廉官时亦上疏荐举过陆陇其，言其“洁己爱民，去官日（回家为父守丧），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时陆任江南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知县，丁父忧^⑦后于康熙二十二年改任的灵寿县知县。嘉定乃富裕大县，而

① 魏象枢，蔚州（今河北张家口市蔚县）人，顺治三年进士、四年授刑科给事中，后历任吏科给事中、左金都御史、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为官信守“虚心屈己是第一难事、第一要务”、“清正俭约是居官之良法”、“与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其有疏言：“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愿诸臣为百姓留膏血、为国家培元气。臣不敢不为朝廷正纪纲、为臣子励名节。”（《清史稿·魏象枢传》）

② 苏赫后官至吏部尚书，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卒；当九卿为其议谥时，称其“品行官业日明敏决断”（《听雨丛谈·卷二·谥法》），但其并未得谥，盖因当时谥法尚不完备。福格：《听雨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2版，1997年12月湖北第3次印刷。福格，汉军镶黄旗人，直隶总督英廉的曾孙，咸丰五年为惠州通判，随军僧格林沁，后曾任山东莒州（今日照市莒县）知州。

③ 范承勋，清初“高风”“元辅”（康熙赐祠匾“元辅高风”）范文程第三子，康熙二十三年以九卿所举迁内阁学士，康熙二十四年授广西巡抚，后任云贵总督、左都御史。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坚定平易”的范承勋接傅腊塔任江南江西总督，康熙三十八年授兵部尚书。

④ 赵仑，莱阳（今山东烟台莱阳市）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历官太常寺少卿等，著有《因树屋集》。

⑤ 崔华，平山（今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六年授浙江开化县（今衢州市开化县）知县；政务宽平，捕盗除派，平乱安民，总督李之芳上奏其事，康熙诏嘉之；后任扬州府知府、代理两淮盐运使、甘肃凉州道（驻凉州，即今武威市凉州区）等。

⑥ 见《郎潜纪闻初笔·卷四·九卿公举廉吏》。

⑦ 丁忧，古制，父母去世后，子女按礼须守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庆典之事，任官者须离职回籍“守丧”，称为“丁忧”；此制源于汉代，清代沿袭。“丁”即遭逢、遭遇的意思。“忧”指父母的丧事。“丁忧”亦有称“丁艰”。

灵寿“土瘠民贫”，陆陇其（浙江嘉兴平湖人）出任灵寿县知县是由“疲、难”而“简”、由“要”缺而“简”缺^①，但这并没有影响陆的用心为官，仅一年后便因政绩突出被巡抚格尔古德看中了。在灵寿七年后，陆改任四川道监察御史^②。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欲用陆陇其补江南学政缺时，臣下告知陆已去世（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两年多了，康熙帝不胜惋惜地发出了“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③的嗟叹，只好用与陆同具清廉名的邵嗣尧^④补之。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初笔》（卷三）中记“邵嗣尧与陆清献（陆陇其）齐名”：“猗氏邵嗣尧，起家县令，循声介节，与吾浙陆清献齐名，历知山东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及直隶柏乡（今河北邢台市柏乡县）、清苑，皆有善政；后由御史督学江南，鲠直公廉，势要敛迹。”

张鹏翮则由兖州府知府擢升河东盐运使，此前张鹏翮任过刑部主事、礼部郎中、苏州府知府，此后张鹏翮内迁通政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至康熙二十八年授浙江巡抚，又相继做过左都御史及刑、户、吏部尚书等职。在处理四川陕西总督吴赫^⑤等“侵蚀贫民籽粒银两”案中，时（康熙三十九年）任江南江西总督的张鹏翮公正详审、拟罪如律。报奏后，康熙帝很是满意，与诸大学士评说：“（张）鹏翮往陕西，朕留意访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后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治河得法有功，康熙又对诸大学士赞赏说：“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在浙江任巡抚时，张鹏翮为“时大僚中清誉久著者”；其视学江南，“信心直行，矢慎矢公，终其任无一幸进者”^⑥。康熙四十二年，张鹏翮以“殚心宣力、清洁自持”加太子太保，雍正元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

① 此时府、州、县的“等级”尚未分得这么细。冯尔康《雍正传》中（292页）载：“道、府、州、县员缺，又分‘繁’、‘简’两项……（雍正）六年（1728），广西布政使金拱提出新的补授办法，即府、州、县的事务分出‘冲’、‘繁’、‘疲’、‘难’4种情况。‘冲’指地理位置的重要，或系交通要道，或系军事重地，或系险阻处所；‘繁’指事务殷杂，或钱粮多，或差役杂，或为首府首县；‘疲’指税粮滞纳过多——原书中未述‘疲’；‘难’指士习刁凌、‘民风强悍’、狱讼繁多，难于治理。”冲、繁、疲、难四字俱全之县（府、州）之令，称为“最要”缺或“要”缺；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3种）的为“要”缺；二字（有冲繁、繁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6种）的为“要”缺或“中”缺；只有一字或无字的为“简”缺。依此，嘉定县当列入“疲、难”，灵寿县当列入“简”（无字）。《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1998年10月第5次印刷。

② 清初设京畿、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5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除负责稽核本道刑名案件、吏治民生外，还分别稽查在京各衙门事务。

③ 见林铁钧、史松：《清史编年·康熙朝》（下，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平装），44页。

④ 邵嗣尧，猗（音一）氏（今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人，康熙九年进士，在临淄、柏乡、清苑及御史诸任之后，于康熙三十年出为直隶守道，为官“持躬清介，苞苴杜绝”、“遇事霆发机激，势要惮之”，“人以包孝肃比之”。康熙二十九年，户部尚书王骥曾以“清廉慈惠”举荐邵嗣尧。在江南学政任上，邵嗣尧“虚衷衡校，论文宗，尚简质，著四书讲义，传习学者……以积劳遣（音构）疾（患病）卒；身无长物，同官敛货致赙（音富，给办丧事人家的钱财等）乃得归葬。士民思之，为立祠肖像以祀焉”（《清史稿·邵嗣尧传》）。

⑤ 吴赫，初为兵部郎中，康熙二十六年任陕西按察使，后历任山西、甘肃布政使及甘肃、陕西巡抚，康熙三十三年任四川陕西总督，再任兵、刑、工部右侍郎及右副都御史、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都统等。

⑥ 见《郎潜纪闻初笔·卷三·张文端清操》。

士，逝后获谥“文端”。张鹏翮是四川遂宁（今遂宁市）人，康熙九年进士。

卫立鼎后任户部郎中、福州府知府。巡抚格尔古德曾这样当面称赞他的知县卫立鼎：“令（卫立鼎）之苦，无异秀才时。秀才徒自苦，今令苦而百姓乐，非苦中之乐乎？”格尔古德前任于成龙亦曾并举过“循吏”陆陇其和卫立鼎。卫立鼎，山西阳城（今晋城市阳城县）人，康熙二年举人。在卢龙县，卫知县“兴行教化，奖拔士类，丕变其俗，尤以清廉著称”。康熙十九年，刑部尚书魏象枢及吏部侍郎科尔坤奉命巡视京畿，至卢龙县，有“一杯水”之名的卫知县将接待诸事完备，魏、科却未就用，仅饮清水一杯，魏尚书说：“令饮卢龙一杯水耳，吾亦饮令一杯水。”

内阁中书、河南仪封（今开封市兰考县）人张伯行，守父丧在家时，大雨毁溃城北旧堤，他自行募民塞堵抢险。张鹏翮知道此事后，便上疏荐举张伯行，用以治河。张伯行上任后果然不负期望，在督修黄河南岸大堤等治河工程中颇有功绩，被任为山东济宁道。其时正闹饥荒，张伯行负责汶上（今山东济宁市汶上县）、阳谷（今山东聊城市阳谷县）二县赈灾；他一面“家运钱米，并制棉衣”，一面果敢地开仓放粮。布政使以其擅自动用“仓谷”上疏论劾。张伯行义正词严：“有旨治赈，不得为（不能算）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命重乎？”为此，康熙特赐其“布泽安流”榜。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又不顾多人非议亲自举荐张伯行任福建巡抚。

在福建巡抚任上，张伯行举荐“清介公慎，杜绝苞苴（音包袱，意指贿赂或馈赠的礼物）”的四川提学道金事（学政属官）陈瑊为台湾厦门道（今福建厦门市）。陈瑊是广东海康（今湛江雷州市）人，康熙帝三十三年进士。在福建古田县（今福建宁德市古田县）知县任上，陈瑊“请平赋役，民以苏息”。调任台湾县（今台湾台南市安平区）知县，陈瑊“兴学广教，在县五年，民知礼让”。康熙四十二年，陈瑊“行取”为刑部主事，再任郎中，出到四川。康熙五十三年陈瑊离开厦门道，被超擢为偏沅巡抚，寻调福建巡抚，其时康熙帝对廷臣评说：“（陈）瑊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称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兼理闽浙总督时，陈瑊奉命巡视海防，自带行粮，其他一概屏绝，且请捐“巡抚公费”充饷。陈瑊“每谓贪不在多，一二非分钱，便如千百万（比如今天所讲的‘零容忍’——贪一分钱也是贪）”。《郎潜纪闻初笔·卷四·陈清端公清操》中载：“公（陈瑊）令古田、调台湾、督川学、巡台厦，开府湖南^①、福建，子身在外几十年，未尝挈（音切，携带）眷属、延幕宾。公子旷隔数千里，力不能具舟车，一往省亲，僦（音欠，侍从）从一二人，官厨以瓜蔬为恒膳，其清苦有为人情万不能堪者，公晏然安之，终其身不稍更变。圣祖目为苦行老僧，又曰：‘从古清官，计无逾瑊者。’盖公之壁立千仞，与张清恪（张伯行）之‘天下清官第

^① 即指其任偏沅巡抚。偏沅巡抚，顺治元年置，驻偏桥镇（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雍正二年移驻长沙，并更名为湖南巡抚。

一’，均邀圣许。”人不能堪的清苦，“大吏”陈瑊能。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陈瑊逝于任上，康熙帝对大学士们讲：“陈瑊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令追授其为礼部尚书，谥“清端”。《清史稿·陈瑊传》中记陈瑊“服御俭素，自奉惟草具粗粝；居止皆于厅事（奉公尽职），昧爽治事，夜分始休”。

被康熙帝誉评为“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风有位”的江宁（今南京市）巡抚汤斌，在查处其他知府、知县治赈不力案后，举荐“居心恬淡，莅事精锐”的吴江县（今江苏苏州吴江市）知县郭琇，郭得授江南道监察御史。康熙对大学士阿兰泰^①等论及郭琇时，表露了其对郭的欣赏并毅然重用：郭琇“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康熙的知人敢任由此可见一斑。山东即墨（今青岛即墨市）人、康熙九年进士郭琇，是在康熙十八年任的吴江县知县，其“材力强干，善断疑狱……居官七年，治行为江南最”；“行取”为江南道监察御史时是康熙二十五年，此后郭琇历职佾都御史、太常寺^②卿、内阁学士、吏部侍郎、经筵讲官、左都御史，康熙三十八年任的湖广总督。《清史稿·列传五十七》“论曰：……郭琇抨击权相，有直臣之风，雷霆一鸣，佾壬（奸佞群小）解体；盖由圣祖已悟其奸，而琇遂得行其志”。

死后被康熙帝誉为“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的李光地^③，在任直隶巡抚时，举荐因病辞去员外郎归家的赵申乔；康熙察赵果然“敬慎”后，赵一下子被提任为浙江布政使。赵申乔是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康熙九年进士，康熙二十年任河南商丘县（今商丘市）知县，颇有惠政。康熙二十五年，赵申乔以“贤能”被行取为候补主事，康熙二十七年实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其任浙江布政使时是康熙四十年，一年后即升任巡抚，再调偏沅巡抚、左都御史、户部尚书。赵申乔为官“弊绝风清……衣冠俭敝，神采刚毅，人望而畏之”^④；不足是过于苛刻，康熙帝曾训诫赵申乔：“尔性苛急，不能容人……尔在官诚廉，然岂可恃廉而矫激乎？”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帝巡视京城

① 阿兰泰，镶蓝旗人，性敏慎，初授兵部笔帖式，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二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康熙三十七年以年老善忘上奏解职，康熙说：“大学士重任，必平坦雍和、任事谨慎者方为称职。至于记事，可令学士任之。”《清史稿·阿兰泰传》中记：“阿兰泰操行清谨，处政府远权势，人莫敢干以私，以是为上（康熙帝）所重。后上与大学士论内阁旧臣，称阿兰泰能强记，且善治事云。”

② 太常寺，顺治元年设，隶属礼部，负责祭祀事务，设卿、少卿、寺丞、典簿等官职。

③ 李光地，安溪（今福建泉州市安溪县）人，幼时即聪颖超常，康熙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康熙十二年归籍省亲，值耿精忠反，其“置疏蜡丸中，遣使间道赴京师”，康熙帝得疏而为之动容，嘉其忠，下兵部录副领兵大臣，后擢侍读学士；康熙十九年诏至京师，授内阁学士，后历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兵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工部侍郎；康熙三十七年出为直隶巡抚，康熙“褒其治绩”，擢吏部尚书仍兼巡抚，康熙四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

④ 见萧爽（音是）：《永宪录》（卷二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8月第1版，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75页。萧爽，江都（今江苏扬州江都市）人，《永宪录》成书于乾隆十七年。

周边地区时，见到李光地，又问其邻省督抚谁贤，李回答说河南巡抚徐潮；后来康熙常将徐潮与李光地、张鹏翮、彭鹏、郭琇一并称颂。徐潮是浙江钱塘人，康熙十二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历任工部侍郎、河南巡抚、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等。《清史稿·徐潮传》中谓其“居官平易，不事矫饰，所至民咸称颂”。李光地还荐保过陈鹏年、张伯行、方苞^①等，其“扶植善类”的做法非常值得称道；但“值得称”归“值得称”，并不等于谁都会心服口服地肯“称”，更不等于就会“得道多助”，甚至有很多人会作梗掣肘。据《清史稿·李光地传》中记，李光地“被上（康熙帝）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光地”。李光地屡遭论劾，康熙帝多为其主持正义，“（李）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于章奏（出谋划策而不见著书面）”。《永宪录》中记李光地“为人负胆略，称敢言，作为制义，士林尊奉之，子孙多贤才”。^②

清官的诚心为政、敢于任事

为官仅有清廉正直是不够的，更要任事有为。清廉正直只能“洁己”，而“洁己”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是无害其他，二可为榜样。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能“洁己”那最好——套用乔治·吉辛^③的一个句式可以这样说：单凭了我的廉洁，我也向国家、社会奉献了一种好处。

其实一个人只顾“洁己”是有些消极的。社会、国家、人民（在封建社会当然包括皇帝）需要的是诚心为政、敢于任事——这正是为官的实际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作为清官是需要一些策略的，是不能只顾“洁己”的。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④有句话可算是一种相关的警示，他说：“我们如果无知或是沉默，这就不

①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今安徽安庆桐城市）人，康熙三十八年乡试第一名、四十五年会试第四名，因母病归而未应殿试；康熙五十年同乡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牵扯其族祖方孝标，而其亦曾为《南山集》作序，获死罪，后经李光地极力营救，夙知其文名的康熙开恩免其罪，并召入南书房；康熙六十一年又任武英殿修书总裁，此后还做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其“见朝政得失，有所论列”，“又请矫积习、兴人才”，“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其文学深厚、著作浩繁，为古文正宗，并开创“桐城派”散文；乾隆十四年以82岁高龄卒。

② 见《永宪录》（卷二上），75页。

③ 乔治·吉辛（1857—190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出身贫寒，曾在曼彻斯特读书，毕业后去伦敦谋生，1880年后以教书为生，同时编辑、撰写小说，内容多描写下层贫苦群众的生活，是最善于写阴暗面的一个作家，其有言：“单凭了我的沉默，我也向一切人奉献了一种好处。”

④ 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拉美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聂鲁达”为其少年写诗时所用的笔名，曾做过驻外大使（驻法国等）、国会议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智利作家协会主席等职，荣获过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诺贝尔文学奖，1948年流亡期间到过中国；其诗歌创作深受波德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早年在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并从惠特曼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倾心的形式，善于运用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追求神秘的内心体验，《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为其成名作，主要诗集有《西班牙在我心中》、《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等。

但是一种罪过，而且也是一个失败的继续。”无知也许不好追究责怪，但沉默特别是“有知”的沉默就至少是“罪过”了——该说话时就应该说话（“有知”的人该说的话应更多），不能任“失败”继续，不能一味地等待“在沉默中爆发”，未然的恰当处理可以更好地避免后悔和损失。

——有人认为“百无一用是正直”^①，这未免有点言重了，也有点偏激，甚至是错误的。其实，正直是做人，而奸猾（贪贿）是做“鬼”。和奸猾一样，正直也是人的秉性，有天生的成分。正直的人很难学会同流合污，有时甚至有很强的逆反心理——你学坏我非学好；不苟同、不迁就正是正直的人的弱点^②，是其不“成功”的根源。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将大好的为官从政空间拱手让于奸猾之辈了。正直的人要想入世为功，必须要学会“隐于朝”，学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必要时甚至要放下坚持遵守不惜“为害”一下，这样才能占据更大的为官从政空间——仅凭此一点也不能说“正直”（或正直的人）百无一用。在这方面，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个例子（虽然其在廉守上有可疑可议之处）；张居正对大宦官冯保的妥协是个典型事例。康熙朝应该算治世，“方”点无所谓，“正直”也有人撑腰。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汤斌继有“余秦桧”之称的余国柱^③任江宁巡抚。已升任左都御史的余国柱，与大学士明珠更加朋比结党，权倾一时。余国柱以减免江南税赋皆得明珠之力为由向汤斌索贿（“江南人宜有以报之”），被汤斌拒绝。其时向明珠行贿的外官很多，络绎不绝，唯独没有汤斌的下属。不仅汤斌，于成龙、郭琇等也都敢于向康熙检举明珠、余国柱。特别是时任佥都御史的郭琇，上疏详列明珠、

① 翟羽佳有《百无一用是正直——官场定律系列》（“中国思维”网·其他研究，2002.12.18）一文，文中有一段：“一定意义上讲，正直、善良这个世界受灾受难的根源。正是正直者的清高或不争，反倒成就了那些投机钻营者……把能够为人民做点好事的活动空间让给了腐败分子。”这是用使命感和责任心来要求“正直者”。我不投机钻营、我正直我还有错吗？难道我不玩“正直”我去同流合污吗？我正直，即使我不去正面打击、制约投机钻营者，我至少可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发挥正义的、健康的正面影响。正直者多，投机钻营者、腐败分子就少。我正直，我就是为人民做了点好事，就是用我的“铁肩”担了点“道义”。面对投机钻营者和腐败分子，翟羽佳所言恰恰反证了“正直”的必要。翟文还有“正直对个人和社会影响力往往可以忽略不计”、“正直是缺乏变通和伪装的无能；正直是不能应变和沟通的无知”等语，皆谬论！翟论的依据可能是“性本恶”——人是学不了好的。另外，我为什么要“变通”、“应变”？——我变什么通、应什么变？遍地“伪装”、“沟通”才称翟某人的意么？

② 《分甘余话·卷四·君子小人势不并立》中传记孙承宗言：“朝廷官职，天下人皆有分，我辈必不与异己者共之。”这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孙承宗，高阳（今河北保定市高阳县）人，“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明万历三十二年以进士第二名授编修，熹宗朱由校初年，清军进逼广宁（今辽宁锦州北镇市），其临危授命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一年，夺官在高阳老家闲住的孙承宗，在清军攻高阳时，其“据守”的号召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响应，城破后自缢而死。王士禛：《分甘余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1版，2006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王士禛，新城（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人，十八岁中举，顺治十五（十二）年进士，历任扬州府推官（专司刑狱的佐官）、礼部主事、翰林院侍讲、刑部尚书，勤于笔耕，诗风苍劲，著有《池北偶谈》、《居易录》、《古夫于亭杂录》等。

③ 余国柱，大冶（今湖北黄石大冶市）人，顺治九年进士，康熙十五年考授户科给事中，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江宁巡抚、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等职，康熙二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时明珠用事，余务罔利以迎合之，一时人称“余秦桧”；及郭琇上疏论劾，言者蜂起，其门人陈世安亦具疏纠之，颇中要害，余遂夺官。